

論輔廣對朱熹《詩經》「言外之意」的 詮釋與展開

史甄陶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輔廣對朱熹《詩經》「言外之意」的詮釋特點及方法。朱熹注解《詩經》時，為要避免〈小序〉的干擾，試圖還原《詩經》文本之意，但是他同時也留意到《詩經》富有「言外之意」，卻沒有進行系統化的闡釋。其弟子輔廣在《詩童子問》中，發揮朱熹《詩傳綱領》中「言外之意」的觀點，並將〈詩大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作為「言外之意」的核心概念，試圖從《詩經》文本內容與修辭手法中，揭露人之情性問題的複雜性，並且指出其理想狀態，展現出不同於尊《序》學者的詮釋旨趣。

關鍵詞：言外之意、朱熹、輔廣、《詩童子問》、《詩傳綱領》

2022/10/11 收稿，2022/11/18 審查通過，2022/12/20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作為方法的『言外之意』——結合《詩經》尊《序》與廢《序》的態度比較」(RG009-D-19) 成果之一，特此致謝。本文初稿曾在2021年8月28日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詩經》跨域研究團隊」中發表，得到本計畫共同合作者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種村和史教授諸多寶貴的意見，以及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史講座教授鄭吉雄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吳國武教授和臺灣大學中文系王誠御博士等人的指正。初稿修改之後，曾在2021年11月20-21日「第十二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由屏東大學中國文學系陳志峰副教授講評，獲益甚多。此外，論文修訂期間，承蒙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國科會贊助客座研究員陳榮灼教授、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祝平次副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極具啟發性的意見，謹此深致謝忱。

** 史甄陶現職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On Fu Guang's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 toward Zhu Xi's theory of "Yan Wai Zhi Yi" based on *Shijing*

Shih Chen-T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Fu Guang's interpretation toward Zhu Xi's "Yan Wai Zhi Yi" (perlocutionary intent, 言外之意) theory based on *Shijing* 《詩經》. When Zhu Xi annotated the *Shijing*,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terference from the "Xiao Xu" ("Small Preface," 小序), he tried to restore the meaning based on the text of *Shijing*. Besides that, Zhu Xi also noticed that there was "Yan Wai Zhi Yi" inside the *Shijing*, but th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had not been done. In *Shi Tong Zi Wen* 《詩童子問》, Zhu Xi's disciple Fu Guang, who developed his viewpoint on "Yan Wai Zhi Yi" from his book *Shi Zhuan Gang Ling* 《詩傳綱領》. Fu Guang took the "arises from the affections and comes to a stop in ritual (發乎情止乎禮)" in the "Shi Da Xu" ("The Great Preface", 詩大序) as the core concept of "Yan Wai Zhi Yi". Based on which, he attempted to expose the complexity of Qing (情) and Xing (性) in human being from the content and rhetorical techniques of *Shijing*, and indicated the ideal condition. As mentioned above, it reveals the difference of the purport of the interpretation between Fu Guang and the scholars who respect the *Shi Xu* (詩序).

Keywords: Yan Wai Zhi Yi, Zhu Xi, Fu Guang, *Shi Tong Zi Wen*, *Shi Zhuan Gang Ling*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一、前言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輔廣如何詮釋朱熹對《詩經》學中的「言外之意」，¹以及在內容上有何展開，從而見出朱子學者與尊《序》學者以「言外之意」解經的差異。²「言外之意」概念的興起與運用，是中國《詩經》學發展中，一個非常值得觀察和研究的方向。雖然「言外之意」在宋代之後，才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課題，但是學者們採取這個概念討論《詩經》，從先秦以來就屢見不鮮，無論是孔子與弟子們的論學，或者孟子推廣性善與王道思想時，都曾經言及。而漢代之後，《詩經》的地位更加提高，注釋類型的著作，前仆後繼地產生。就著注釋內容來看，《詩經》文本當然是解讀的重點，然而對於「言外之意」的發揮，也不曾缺席，甚至到宋代受到更多的關注。³至

¹ 輔廣，字漢卿，別號潛庵，後人尊稱為傳貽先生。輔廣早年從學於呂祖謙，迨呂祖謙過世後，投身於朱熹門下，成為朱熹重要的門人之一。朱熹賞識其刻苦向學的態度，曾在給他的信中說：「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眾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見〔宋〕朱熹：〈答輔漢卿廣一〉，收於〔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6冊（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卷59，頁2894。而輔廣「在朱學被視為偽學當中，昂然挺立，以自身行止來證成朱學價值的重要人物，輔廣從呂祖謙浙學轉為朱熹閩學，又在學禁氛圍當中堅持成學的代表，在朱門弟子當中，極具指標地位」。陳逢源：〈體察與思考：《四書大全》中的輔廣〉，《政大中文學報》第37期（2022年6月），頁280。文及翁〈傳貽書院記〉中記載：「文公門人遍天下，中更偽禁，歲寒松柏，疾風勁草，磨涅而不磷緇者，絕無而僅有。於時潛庵輔公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自祠官報罷，歸隱語溪，題讀書之堂曰『傳貽』，蓋將以傳之先儒貽之後學為己任。著書滿家，《易》、《書》、《詩》、《春秋》、《禮記》有注釋，《大學》、《孟子》、《中庸》有問答，《通鑑》有說，《師訓》有編，《日新》有錄，雜著有稿。」〔元〕徐碩：《至元嘉禾志》，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25，頁14。可見其著述不少，然而被保存下來的僅有《詩童子問》一書，其他的著述大多散佚。《詩童子問》的內容主要是「羽翼《詩集傳》，以述平日聞於朱子之說」。〔清〕永瑤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5，頁28。可以說是針對朱熹注釋《詩經》的再解釋，類似於「疏」的作用，其內容引申、發揮朱熹的看法，不遺餘力。此外，輔廣向朱熹問學的記載，目前保存於《朱子語類》中，約四百三十多條，也是了解其學問思想的重要資料。

² 檀作文說：「《詩經》學漢、宋之爭的關鍵在於是在尊《序》還是廢《序》。落實到文本闡釋上，實際只是個是否依《序》說詩的問題。」檀作文：《朱熹詩經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頁22。本文所謂「尊《序》」，指的是學者在解釋詩意時，遵奉《詩序》為唯一的詩旨，如鄭玄、孔穎達、歐陽修、呂祖謙、嚴粲等人。

³ 黃忠慎說：「漢代文獻未曾出現『意在言外』之字眼，但漢儒解《詩》的目的就是在將詩歌的弦外之音傳遞給讀者。」又說：「宋儒對於『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有豐富的表述，……」

於「言外之意」的分析重點，黃忠慎教授曾言簡意賅地指出：「其一為『言外之意』的『意』所指為何？其二為『言外之意』為何人之意？」⁴就著前者而言，他採用徐復觀的看法，主張《詩經》「言外之意」的「意」，主要是具有「情感」的「意味」，⁵作為連結《詩序》與《詩經》文意的橋樑；就著後者而言，「言外之意」不限於作者之意，《詩緝》當中絕大部分都是聖人、國史之意。⁶種村和史教授則是更進一步討論〈小序〉與「言外之意」成立的關係，⁷不僅更細緻地分析嚴粲的觀點，同時也梳理影響嚴粲之學者的看法，諸如呂祖謙、蘇轍、朱熹、輔廣等人的意見，以及關注嚴粲學說對元明清《詩經》學的影響。在尊《序》的脈絡下，種村和史教授將《詩經》的「言外之意」分為三種型態，⁸顯示其多元性。並且，他也指出這個手法其實並不限於尊《序》的學者，也適用於全部的《詩經》學史。也就是說這在主張廢《序》的朱熹和輔廣等人手中，⁹同樣作為他們讀取道德教訓的手段，¹⁰發人深省。

並以為詩有兩個層面以上的意義存在，甚至已經暗示兩層意義的輕重、主客之分。只有第二層意義、處於言外的意義才是第一義，也就是作者所要傳達的真意。」黃忠慎：〈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姚際恆、崔述、方玉潤》（臺北：五南圖書，2012年），頁70-71。

⁴ 黃忠慎：《嚴粲詩緝新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頁29。

⁵ 徐復觀說：「意義的意，是以某種明確的意識為其內容；而意味的意，則並不包括某種明確意識，而只是流動著一片情感朦朧縹緲的情調。此乃詩之所以為詩的更直接表現，所以是更合於詩的本質的詩。」徐復觀：〈釋詩的比興——重新奠定中國詩的欣賞基礎〉，《中國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74年），頁114。這只能說是言外之「意」的其中一類，並且是從文學角度的解讀。若是從經學的角度，在《詩經》歷代注釋中的「言外之意」，著重於道德意識之闡發，更接近「意義」之「意」。

⁶ 黃忠慎：《嚴粲詩緝新探》，頁30。

⁷ 〔日〕種村和史：〈「言外の意」の遠近法：その多様性、および詩經の意味の重層性における位置付け〉，《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人文科学》第35期（2020年6月），頁6（318）。

⁸ 種村和史教授將「言外之意」分為三種類型：一、以詩人有意識地使用的修辭技法之「言外之意」；二、以詩人無意識、無自覺混入之「言外之意」，或是以詩句上無法完全表現之餘蘊之「言外之意」；三、後代人自詩篇任意或與其原意無關地讀取的道德意義之「言外之意」，即是「斷章取義」。同上註，頁47（340）。

⁹ 本文所說之「廢《序》」，又稱之為「反《序》」，指的是朱熹和輔廣等，在解釋詩意時，並未將《詩序》作為詩旨的獨一之正確解答，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全然不用《詩序》，朱熹也說：「《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80，頁2077。也就是黃忠慎所說：「朱子不是遵奉《詩序》之說，他是尊重《詩序》而不全盤接受。」黃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2002年），頁58。

¹⁰ 〔日〕種村和史：〈「言外の意」の遠近法：その多様性、および詩經の意味の重層性に

在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之下，關於尊《序》學者說明「言外之意」的特點，已經頗為深入，然而廢《序》學者對「言外之意」的思考，仍有值得繼續探討之處。其中有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對於尊《序》的學者，「言外之意」是他們得以藉《序》解《詩》的關鍵，表達出較不相信《詩》之文本的態度，然而朱熹又是如何理解《詩經》的「言外之意」呢？他的弟子又是如何呢？眾所周知，朱熹之所以重新注釋《詩經》，主要是為了去除〈小序〉對詩意的干擾，恢復詩人的「本意」，¹¹可說是廢《序》派的泰斗。在掌握《詩》義的方法上，朱熹主張要藉由誦讀，了解文本的「語脈」，¹²並在《詩集傳》中，依循經文文意的解說方式，是他注《經》的主要特色。何基曾說：「朱先生解經，只就句裡轉。」¹³這個特點在《詩集傳》中，非常明顯。朱熹解釋《詩經》時，關注的重點是《詩經》文本之意，反對《詩序》美刺之說。¹⁴馬端臨曾經評論道：「《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¹⁵朱熹的做法，的確將《詩經》的題旨，從《詩序》中解放出來，試圖還原《詩經》文本之意。然而，這並不表示朱熹認為詩的含意僅在經書文本中呈現。他同時也注意到《詩經》有「言外之意」，曾對陳文蔚解釋〈烝民〉第 2 章時說：

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卻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

おける位置付け)，頁 12 (375)。種村和史的文章中，雖然談到朱熹將「言外之意」之概念使用在《詩經》的解釋，但是其思考此問題的方式，仍然與探討尊《序》學者的手法一樣，將「言外之意」當成《詩經》學的一個命題來處理，與本文將朱熹與輔廣「言外之意」的觀點，作為一種透露人之情性狀態的視角，並不相同。

¹¹ 朱熹說：「今人不以詩說詩，卻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80，頁 2077。

¹² 朱熹說：「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話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卻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脈所在。」同上註，頁 2083。

¹³ 〔宋〕金履祥：《論孟集注考證》，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0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頁 6。

¹⁴ 朱熹說：「《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序詩者妄誕其說，但疑見其人如此，便以為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80，頁 2077。

¹⁵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五）》，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78，頁 20。

「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¹⁶

這段話主要是回答陳文蔚對朱熹的詢問。由於朱熹在《詩集傳》中，引用呂祖謙對此章的解釋，說明仲山甫在儀表上展現「柔」德，此合乎文本之意。然而朱熹卻在此提醒陳文蔚，若是從道德修養的角度來看，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不能只有「柔」，而是「其中自有骨子」，也就是乾德之剛健不息，更須留意。由此可見，朱熹雖然一方面在詩之文辭中求其含意，但是另一方面，他也關注詩中的「言外之意」。朱熹也曾說：

大凡事物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箇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¹⁷

他很明確地注意到詩的兩重讀法，一是隨文解意，一是留意詩中「意思好處」，也就是言外之意。然而何謂「意思好處」？他曾說：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而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著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¹⁸

朱熹認為「好的意思」，除了在作者一面，需要留意詩中的人情物態，同時在讀者一面，還需關注自家身心是否有所感發。這乃是朱熹所關心的言外之意，而其觀點大多被記錄在《朱子語類》中，並未在《詩集傳》中發揮，¹⁹

¹⁶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81，頁 2137。

¹⁷ 同上註，卷 114，頁 2755。

¹⁸ 同上註，卷 80，頁 2082。

¹⁹ 朱熹說：「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同上註，卷 19，頁 438。可見朱熹在注釋經典時，採用的方式與程頤不同。他注解的原則是「發明其辭」，至於辭中之理需要讀者自行體會，而非由他在經解

這是他解經的分寸。但是到了朱子學者的手中，為了疏解朱熹的意見，採取的態度便不相同。這樣的差異，在朱熹《詩集傳》及其弟子輔廣《詩童子問》的對照中，表現相當明顯。因此本文將從輔廣《詩童子問》出發，探討他如何詮釋朱熹所說的「言外之意」。雖然此議題過去已被學者關注，²⁰然而仍有值得深入探討之處。本文認為，輔廣闡釋朱熹《詩集傳》時，其所關注的「言外之意」，具有多層次的視角——除了承襲北宋到南宋學者們的觀點之外，他還從〈詩大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修辭手法和義理思想等層面，加以發揮。本文希望藉由這個角度，不僅凸顯廢《序》學者思考「言外之意」之特色，並與尊《序》學者之論點，有所比較。

二、從《詩傳綱領》確立「言外之意」

輔廣有意識地發揮朱熹「言外之意」的概念，這在他對《詩傳綱領》的注釋中，表現得格外明顯。根據朱杰人的研究，《詩傳綱領》是朱子晚年所著，成書時間晚於《詩集傳》，同時朱熹自己的著作中，幾乎無一字論及《綱領》，目前僅有朱熹在〈答吳伯豐〉中，回答吳必大的提問，以及《朱子語類》中記錄朱熹與學生們的討論。²¹而輔廣在《詩童子問》中，不僅注解《詩集傳》，同時也包括《詩傳綱領》，可說是首位在文獻上明確建立《詩集傳》與《詩傳綱領》之連結的學者。²²而他多半以「言外之意」的說法，

中直接說明。這樣的讀經態度，也可以在《詩集傳》中看見，只是《詩經》與其他各經稍有不同，朱熹說：「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80，頁 2082。

²⁰ 關於輔廣對「言外之意」的重視，黃忠慎已經指出：「輔廣詮釋空間受到朱子的牽引，因此《詩童子問》並沒有太多新穎的見解，然而輔廣仍秉持文字無法傳遞背後真理的態度，抒發他對三百篇的意見。」又說：「由輔廣對於訓詁的態度與解釋之措辭，可知其相當肯定探索言外之意的必要性。」黃忠慎：〈經典、道與文字——輔廣與楊簡《詩經》學之比較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 16 期（2011 年 12 月），頁 157-158。本文在此論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探討輔廣「言外之意」的論點與特色。

²¹ 朱杰人：〈朱子《詩傳綱領》研究〉，收於鍾彩鈞主編：《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 年），頁 28-41。此外，就目前可見宋本《詩集傳》來看，《詩傳綱領》並沒有收錄其中。趙長征：〈前言〉，收於〔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頁 7。

²² 輔廣重孫輔政，於宋度宗咸淳 7 年（1271）所刊刻之《詩童子問》的序文中，提到「傳貽手筆每章之下有缺文焉，意者亦欲如《論孟童子問》，先載師說而以己意附於後」。（〔宋〕輔廣著，田智忠輯校：《輔廣集輯釋·附錄》下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 年），

凸顯朱熹所收錄之文獻的要點，強化其作為《詩經》之總綱要領的位置。例如在《詩傳綱領》中，朱熹收錄《論語》這兩段對話：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²³

朱熹注解前一段文字時說：「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²⁴這表示他已經留意到孔子與弟子的對話中，子貢引用《詩經·淇奧》之句，重點不在文本之意，而是在沒有說出來的意思中。但是朱熹並沒有指出其內容為何？輔廣則針對上一段〈學而〉篇的內容，說：

此下二節，又見孔門弟子善於學《詩》，不泥章句，而又能得其言外之意如此。《集解》云：「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²⁵

又在〈八佾〉的引文下說：

頁1530。可見輔廣在寫作注解時，特別留意為朱熹之說保留空缺，欲將自己的意見附於其後。而輔廣作注的內容不僅限於《詩集傳》，同時也包括《詩傳綱領》、《詩序辨說》，並編有「師友粹言」，這些都在《詩童子問》的範圍內。《詩童子問》可分為二十卷本和十卷本，目前可見最早的版本是上海圖書館藏元至正3年（1341）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本之影印本，為二十卷本。朱彝尊《經義考》保留胡一中所寫之序言，其中提到：「載文公《傳》於上，《童子問》於下。」〔清〕朱彝尊著，林慶彰等編審：《點校補正經義考》第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8年），頁72。可見此書刊刻方式合乎輔廣原意。而十卷本則是明代汲古閣刊本，也就是四庫全書本之底本，較接近輔廣初本的樣式。關於這兩個版本的內容，田智忠說：「經過我們的細緻比較，發現二十卷本中的『童子問』部分與十卷本的內容完全一致。」〔宋〕輔廣著，田智忠輯校：《輔廣集輯釋·整理說明》上冊，頁1。

²³ 〔宋〕輔廣：《詩童子問·詩傳綱領》，收於《詩經要籍集成（修訂版）》第8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頁261，「卷首」。

²⁴ 〔宋〕朱熹：《詩集傳·詩傳綱領》，頁9。

²⁵ 〔宋〕輔廣：《詩童子問·詩傳綱領》，頁261。

子夏以文學稱，故其讀《詩》深得其文義曲折之意，所以能因《詩》以知學。學者能如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則《詩》之益於人也大矣。人雖不可以不學《詩》，而學之者又不可泥乎章句、入於穿鑿而失之固也。²⁶

輔廣強調子夏從「文學」的角度讀《詩》，因此能不拘泥於章句，而得其言外之意，這點主要依循朱熹的看法。²⁷然而在輔廣疏解這兩段文字時，皆引用謝良佐「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可見輔廣認為孔子在與子貢、子夏的對話中，看似論《詩》，卻是論「學」，明確指出言外之意的重點。

輔廣除了留意作者有「言外之意」，同時也關注讀者的「言外之意」。後者早在孔子提出「興於《詩》」時，就已經受到重視。朱熹將此句收錄於《詩傳綱領》中，並解釋道：「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²⁸同時，朱熹也收錄程顥之言：「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²⁹可見朱熹相當重視讀《詩》對於人之情性的影響。³⁰輔廣則更進一步發揮朱熹的意見：

《詩》之作，本於吟詠情性，故讀之者亦當吟詠其情性，使其心意沈浸舒快於道德之中，有所慕樂而動蕩鼓舞之，直與曾點浴沂

²⁶ [宋] 輔廣：《詩童子問·詩傳綱領》，頁 261。

²⁷ 孔門四科中的「文學」，朱熹曾下過定義。他說：「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又說：「程子猶以為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為詞章者，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宋]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收於[宋] 朱熹著，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787。

²⁸ [宋] 朱熹：《詩集傳·詩傳綱領》，頁 8。

²⁹ [宋] 朱熹：《近思錄》，收於[宋] 朱熹著，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13 冊，頁 199。

³⁰ 王倩說：「朱熹明確地認定，《詩經》既是緣情而作，又是聖人用以教導世人的典範，所以他具有感發人向善的作用，可以滌蕩人心，陶冶情操。」王倩：《朱熹詩教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63-164。郝永認為「朱熹在歐、蘇的基礎上，建立了系統的《詩經》三百『情性』說體系」。郝永：《朱熹《詩經》解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88-191。然而本文認為，朱熹的確提出《詩經》與「情性」說的關係，但是其言論多半被收在《詩傳綱領》與《朱子語類》中。朱熹從「情性」論《詩》，僅有開創之功。然而真正扣緊《詩經》內容，全面系統性地建立《詩經》「情性」說的學者，應該是輔廣。請見以下二節的討論。

風零之氣象一般，方能有益。³¹

輔廣從作者之情性出發，強調讀者之情性可以藉由閱讀《詩經》而被作者感發，情性是作者與讀者得以發生共鳴之處，以期達到如同曾點「胸次悠然自適，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妙之，隱然自見於言語之外」的境界。³²這對輔廣而言，也正是程顥所說的「使人長一格」處，是讀《詩》之效用。³³

同樣地，輔廣對《詩傳綱領》所錄張載之說的解釋中，也能看出他對《詩經》言外之意的重視。張載說：「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這段話主要是談追求詩人之志的態度。輔廣的解釋如下：

艱險與平易正相反。雖云目前事，若無義理在其間，是特淺妄鄙俚之言耳。唯所言皆目前事，而卻有義理存乎其中，此其所以為詩也。然人能言到此，亦甚難。以平易求之，則無所窒碍，故其意思既廣且遠。若用意愈艱險，則說愈鑿，而愈入於淺近矣。³⁴

輔廣根據張載之說，留意詩有兩個層面：一是詩之語言文字所表述的內容，多為詩人的「目前事」、「眼前事」，是可見的部分；一是詩中的義理，是詩之所以成立條件，卻是一般人不容易言及之處。雖然輔廣沒有明說，但是前者與後者對照，可以看出「言內」與「言外」的區別。對於後者，需要以平易的態度追求，方能得其廣遠之意。

從上述的討論可知，輔廣將「言外之意」作為一種方法，搭建起《論語》、《孟子》和北宋至南宋理學家的言論，與《詩經》之間的橋樑，凸顯朱熹《詩傳綱領》中的要點。雖然朱熹《詩傳綱領》與《詩集傳》的寫作旨趣，有所不同，但是輔廣特意將《詩傳綱領》置於《詩童子問》的卷首，並且加以注解。由此可見，在輔廣看來，朱熹《詩傳綱領》與《詩集傳》所要傳達理念是一致的。以下的討論則是回到朱熹《詩集傳》，更進一步探討輔廣如何在注釋中發揮《詩經》的「言外之意」。

³¹ [宋] 輔廣：《詩童子問·詩傳綱領》，頁 262。

³² [宋] 輔廣著，田智忠輯校：《論語答問》，《輔廣集輯釋》中冊，頁 867-868。

³³ [宋] 輔廣：《詩童子問·詩傳綱領》，頁 262。

³⁴ 同上註。

三、發揮《詩集傳》的「言外之意」

朱熹的《詩集傳》以緊貼文本解說見長，對《詩經》的言外之意，很少發揮。然而輔廣以「人之情性」為焦點，闡釋朱熹《詩集傳》，對其「言外之意」有更豐富的解說。輔廣在注解朱熹《詩集傳》時，有三次直接言及「言外之意」。第一次出現在〈關雎〉，輔廣說：

首章是言初見太姒時事，次章則本其未得而言，末章則據今已得而言。此譬如今人求賢取友，既得而喜，則追言未得之憂思，而又言今得之和樂，是乃人情也。先生發「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有如此者」，與夫「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己，又如此云」，深得詩人言外之意，先儒皆所未及也。³⁵

輔廣認為朱熹從「人情」的角度出發，將〈關雎〉二章和三章，分別以「未得之憂思」和「已得之和樂」加以說明，已掌握〈關雎〉作者的「言外之意」。第二處則是〈卷耳〉，輔廣說：

又謂「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傍」，更不消添字說得，而后妃貞靜專一之意，皆可見於言外矣。³⁶

他主張作者——后妃「貞靜專一」的態度，是朱熹解說〈卷耳〉一章時，所強調的「言外之意」。第三處則是〈采芣〉第一章，輔廣說：

此詩是家人敘夫人誠敬以奉祭祀之事而美之，故言「於何所而采芣乎？于沼于沚而采之也。於何事而用之乎？於公侯之祭而用之也」。其敬事之意，自見於言外。³⁷

輔廣針對朱熹所說「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指出詩中雖無一「敬」字，但是詩中的對話，自然傳達出夫人敬事的態度，這就是作者的言外之意。以上三處的例證，正說明輔廣已經注意到，

³⁵ 〔宋〕輔廣：《詩童子問·周南·關雎》，頁 295。

³⁶ 〔宋〕輔廣：《詩童子問·周南·卷耳》，頁 296。

³⁷ 〔宋〕輔廣：《詩童子問·周南·采芣》，頁 299。

作者所體現的道德精神，也就是《詩經》中沒有明說的情性之學，是言外之意的關鍵。由此可見，雖然輔廣使用「言外之意」四字的次數，看似不多，但是以「性情之正」詮釋《二南》以外的詩篇，並且探究人的情性問題，很明顯地是輔廣注釋《詩經》的核心議題。

「性情之正」是朱熹對〈關雎〉作者的評論，³⁸輔廣則將此應用在〈周南·樛木〉、〈召南·江有汜〉、〈邶風·日月〉、〈邶風·旄丘〉和〈鄘風·鶉之奔奔〉等詩之作者的解說上，這是朱熹概念的延伸。此外，在《詩童子問》中，輔廣更常使用「發乎情，止乎禮義」來說明詩人的性情。³⁹這句話出於〈詩大序〉：「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由此可以看出輔廣與朱熹在詮釋上的異同之處。朱熹在《詩傳綱領》的第一條，就是收錄〈詩大序〉全文。朱熹曾說：

按舊〈關雎〉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
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⁴⁰

很顯然地，朱熹認為〈詩大序〉中囊括《詩》之綱領，因此才將〈大序〉置於《詩傳綱領》之首。由此看來，輔廣以「發乎情，止乎禮義」解釋《詩經》文本，並不違背朱熹的意思。但是比較微妙的是，從《詩序》的文本脈絡來看，「發乎情，止乎禮義」主要是說明變風之詩。朱熹曾明確反對以此說分析正風之詩，說：

諸說多引「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為言，以《序》考之，此言乃
為變風而發，然已頗有可疑者，尤非所以論〈關雎〉也。⁴¹

這段話主要是針對程頤其弟子謝良佐等人，以「發乎情，止乎禮義」分析〈關雎〉，甚至《二南》，⁴²朱熹認為並不妥當。同時，若以此說明變風之詩的特點，朱熹認為也不完全準確：

³⁸ [宋]朱熹：《詩集傳·周南·關雎》，卷1，頁3。

³⁹ 在《詩童子問》中，輔廣直接以「發乎情，止乎禮義」評論的詩有〈周南·汝墳〉、〈召南·標有梅〉、〈邶風·北門〉、〈鄘風·柏舟〉、〈鄘風·君子偕老〉、〈鄘風·載馳〉、〈鄭風·緇衣〉、〈鄭風·出其東門〉、〈唐風·葛生〉。此外，輔廣注釋《詩經》時，大多環繞此意發揮。

⁴⁰ [元]劉瑾著，李山主編：《詩傳通釋·詩傳綱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4。

⁴¹ [宋]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3，頁671。

⁴² 程頤說：「唯〈關雎〉則止乎禮義。」謝良佐說：「〈關雎〉之義，『發乎情，止乎禮義』」

曰：「或謂詩三百篇雖有美惡怨刺之不同，然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此其所以為思無邪者歟？」曰：「此《詩序》之言也，然愚嘗竊有疑焉。夫變風〈鄭〉、〈衛〉之詩，發乎情則有矣，而其不止乎禮義者，亦豈少哉？」⁴³

在朱熹看來，〈鄭風〉與〈衛風〉之詩只能說「發乎情」，但不符合「止乎禮義」，所以對這句話的可信度，有所保留。⁴⁴然而，朱熹的態度也並不是那麼徹底，他的學生潘友恭以「發乎情，止乎禮義」論正風之詩〈標有梅〉，朱熹曾稱讚其說「甚善」，潘友恭的意見是：

〈標有梅〉上二句，蓋言男女之念，人皆有之；而若是者，皆女子之發乎情，而不能以自達者也。下兩句，蓋言必待媒妁之言，婚禮之備，而後可行，亦止乎禮義之謂也。⁴⁵

他從「情」與「禮」兩方面，說明此詩之要旨。這樣的分析手法，同樣也出現在輔廣《詩童子問》中。輔廣對〈標有梅〉的解說是：

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士之求也。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讀此詩者，要當以是觀之。懼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蓋不獨變風為然矣。⁴⁶

若是從〈標有梅〉的文意來看，僅能得知女子渴望出嫁的心情，以及堅持等待年輕人追求的態度。至於「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皆未直接出現在詩中。輔廣則是超出文意，援引孟子之言作為解讀〈標有梅〉的根據。

是也。」謝良佐又說：「二南之詩，發乎情，止乎禮義，人道之極，皆盡性至命之事。」〔宋〕朱熹：《論孟精義》，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2上，頁36；卷9上，頁23。

⁴³ 〔宋〕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2，頁638。

⁴⁴ 朱熹曾在《詩傳綱領》中，批評〈詩大序〉「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之句，說：「然此言亦其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宋〕朱熹：《詩集傳·詩傳綱領》，頁7。

⁴⁵ 〔宋〕朱熹：〈答潘恭叔六〉，收於〔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5冊，卷50，頁2287。

⁴⁶ 〔宋〕輔廣：《詩童子問·召南·標有梅》，頁301。

在輔廣的發揮下，「發乎情，止乎禮義」成為詩人「性情之正」的另一種說法，不僅適用於變風之詩，同時也可以說明正風之詩。因此，輔廣可說是繼承北宋以來學者的看法，並不限於〈詩大序〉「發乎情，止乎禮義」所指涉的對象。

然而，對朱熹和輔廣而言，《詩經》並非所有的詩都是詩人「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結果。《詩經》當中也會有惡詩，因此輔廣在詮釋作者的「言外之意」時，會出現對作者「情性駭蕩」的批評。然而對讀者而言，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朱熹的解釋是：「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⁴⁷可見在朱熹和輔廣看來，讀者閱讀淫詩時，自己要心存警惕。朱熹曾說：「若疑鄭、衛之不可為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覆玩味，應不費工夫也。」⁴⁸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淫詩，則無需採取吟詠諷誦的方式，只需要在「說道理處」玩味即可。然而《詩經》文本並未有「說道理處」，於是需要藉著後人的注解，來提示讀者普遍皆有的道德自覺，進而知道內容的不堪，引起價值上的共鳴。這部分的內容，成為輔廣在注釋中特別發揮之處。以〈月出〉、〈澤陂〉為例，他曾如此評論道：

男女相說，至於憂思感傷，如〈月出〉、〈澤陂〉之詩，則其末流之害，當何如哉？男有男之業，女有女之事，今也相與慕悅憂傷，至於寤寐無為，盡廢其事業焉，是亦可憂也已。情思之流，其弊必至於此。⁴⁹

輔廣認為這兩首詩之所以有問題，關鍵不在男女相悅，而是男女之間因為相思而感傷，整天無所事事，荒廢事業，這樣毫無節制的表現，已經失去該有的情性之正。如此的觀點，〈桑中〉的註解中亦然。他主張這詩之所以是「淫亂者所自作」，是因為「〈桑中〉之詩雖肆言無忌，然誣上行私之心自在，此皆緣民情流蕩，無所限節之故」。⁵⁰又如他在評論〈采葛〉時說：「采葛、采蕭、采艾，其為託言，明矣。至於思念之情，流而不止如此，則以

⁴⁷ [宋]朱熹：〈答呂伯恭書三十二〉，收於[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4冊，卷34，頁1369。此段文字也收錄在[宋]輔廣：《詩童子問·師友粹言》，頁290。

⁴⁸ [宋]朱熹：〈答朱飛卿〉，收於[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6冊，卷56，頁2716。又收於[宋]輔廣：《詩童子問·師友粹言》，頁285。

⁴⁹ [宋]輔廣：《詩童子問·秦風·澤陂》，頁329-330。

⁵⁰ [宋]輔廣：《詩童子問·鄘風·桑中》，頁311。

為淫奔之辭者，宜矣。」⁵¹朱熹將此詩視為淫詩，是因為詩人「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⁵²輔廣進一步批判詩人之情「流而不止」，也就是毫無節制，才會寫出淫辭。輔廣的解說，已經超出《詩經》文本之意，而是站在讀者的角度，透過作品而對作者的人格修養做出評論。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知輔廣詮釋《詩經》及朱熹《詩集傳》，⁵³不以說明「辭意」為解釋的終點，而是從此出發，將重點置於作者是否表現出合宜的情感，《詩經》也就成為傳達作者道德修養的憑藉。⁵⁴由此可見，輔廣雖然看似繼承朱熹，然而其最主要的貢獻是明確轉換解說《詩經》的視角，試圖從《詩經》中揭露人之情性的各種信息。這顯然是輔廣發揮《詩經》「言外之意」的特點。

四、《詩經》修辭手法中的「言外之意」

輔廣以詩人之情性的角度，說明作者的言外之意，除了上述針對《詩經》內容的解釋之外，也從作者寫作風格入手，關注作者在寫詩時的遣詞用字手法，以及對文意的鋪陳與安排方式，藉此解釋《詩經》所傳達作者的情性狀態。也就是說，了解詩人的言外之意，不僅要留意他說什麼，也要注意他怎麼說。對輔廣而言，這同樣也是探討人之情性問題的關鍵處。種村和史在討論尊《序》觀點下的「言外之意」時，曾說到修辭手法也是表達的方式之一，並且這個問題早在北宋司馬光就已經有所留意。⁵⁵對於主張廢《序》的輔廣，同樣也關注修辭問題，但是輔廣主張修辭問題關涉作者內在的德性問題，與尊《序》學者將「言外之意」的修辭問題，視為作

⁵¹ [宋] 輔廣：《詩童子問·衛風·采葛》，頁 316。

⁵² [宋] 朱熹：《詩集傳·王風·采葛》，卷 4，頁 72。

⁵³ 輔廣在《詩童子問》中，雖然以注釋朱熹《詩集傳》為主要目標，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完全接受朱熹的看法，對《詩經》文本毫無考慮。這點從他對〈木瓜〉一詩的說明中，可以得知。他說：「嘗試思之，〈靜女〉之詩，其為男女相贈答，於詩文可見。至此詩，則全不見有男女之辭。若只據詩文，以為尋常相問遺之意，似亦通。先施之者雖薄，而後報之者常過厚，是亦忠厚之情也。」[宋] 輔廣：《詩童子問·衛風·木瓜》，頁 315。由此可見，他並不全然贊成朱熹將〈木瓜〉視為「男女相贈答之詞」。

⁵⁴ 徐復觀說：「中國較西方早一千六百年左右，把握到『作品與人』的不可分割的關係。則由提高作品的要求進而提高人自身的要求，因之提出人格修養在文學藝術創造上的重大意義，乃係自然的發展。」徐復觀：〈儒道兩家思想在文中的人格修養問題〉，《中國文學論集續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 4。

⁵⁵ [日] 種村和史：〈「言外の意」の遠近法：その多様性、および詩經の意味の重層性における位置付け〉，頁 1 (386) -4 (383)。

者在個別而具體的環境和情況下的情緒表現，⁵⁶兩者各自討論的重點，有所不同。

輔廣認為詩人的性情之正，自然在詩歌的語言上，會表現出以下的特徵。首先，詩的敘述有秩有序。以〈白華〉為例，輔廣說：

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始言其體尊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溉物；四章然後自歎以其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其言亦可謂有序矣；五章又疑己雖念王，而王不顧己，何哉？六章始以鷺比褒姒，而歎王之舉措取舍之非宜；七章則遂言王之二三其德，曾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重，寵嬖賤妾以輕賤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成病。其言有序而不亂，其怨有則而不流，即其言以觀其人，則申后其亦賢矣哉。⁵⁷

他對此詩作者的判定，乃是根據朱熹所說「申后作此詩」而來。⁵⁸在這個基礎上，輔廣從申后見黜的處境出發，描述其對幽王的顧念，以及對自身遭遇的感傷，並將此詩八章的譬喻，梳理為一個「其言有序，其怨有則」的心路歷程。然而輔廣的注意力並不只停留在詩的內容上，⁵⁹而是更進一步從此詩的敘述有條理，推論作者申后在抒發情感時不混亂，進而判斷其賢德。由此可見，如何從可見的詩之語言表現方式，凸顯出不可見的作者之人格修養，是他最關心的問題。

其次，輔廣也提出詩之歌詠型態與詩人情性的關係。輔廣對〈緇衣〉一章的解說如下：

「緇衣之宜兮」，此美武公之德，稱其服也。「敝，予又改為兮」，欲其服之常新也。「還，予授子之粢兮」，欲其粟之常繼也。既

⁵⁶ [日]種村和史：〈増殖する言外の意：その共時的通時的様相と詩經解釋學史上の意義〉，《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中国研究》第14期（2021年3月），頁62-63。

⁵⁷ [宋]輔廣：《詩童子問·小雅·白華》，頁365。

⁵⁸ [宋]朱熹：《詩集傳·小雅·白華》，卷5，頁364。

⁵⁹ 關注《詩經》敘述之次第，輔廣並非第一人。孔穎達注釋〈大明〉第5章說：「始於聞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此章文有倫次。」〔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音釋，朱杰人等整理：《毛詩注疏》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394。然而孔穎達僅注意詩文本本身之敘述，並沒有進一步討論作者與此有何關係。由此對照可知，輔廣對於《詩經》的關注不僅限於文本，同時他更關注文本背後的作者之性情。

欲其服之常新，發乎情性，形於歌詠如此，則其好善之誠心，於是為至矣。⁶⁰

輔廣特別強調此詩之作者，藉由稱讚鄭武公朝服的美好，並且強調願意為它改制翻新，傳達出對武公的感情。然而不僅如此，作者好善之誠心，以歌詠方式呈現，表現得更加誠摯。在輔廣看來，〈芣苢〉也有同樣的特徵。他說：

雖「薄言采之」，而采之多，以至於袺與褫焉。其形於歌詠，意簡而辭複如此，則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⁶¹

輔廣關注到〈芣苢〉作者在詩中對動作的描述，從「采」之多，再到「袺」與「褫」，既合乎情理且言之有序，並且以歌詠的方式呈現，含意簡潔，字詞複沓，表現出和平之意。

第三，輔廣也看出，《詩經》中「重言」的寫作手法，也與詩人之情性相關。在〈園有桃〉二章中，他說：

歌謠之不足，而聊以出遊於國以寫其憂，正以其無可告語者故耳。罔極，則不止以為驕也。重言人不知為不思想者，其情深切，而猶欲其反思，以得其是非之正也。⁶²

此詩主要表達魏國小而無政，詩人憂時傷己的情懷。詩中「其誰知之」重複兩次，輔廣認為這是情意深切的表現，同時也有警惕國人的作用。至於〈漢廣〉三章皆重複「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輔廣說：

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敬慕有不能自己之意也。⁶³

這是為了表達對漢之游女情不自禁的敬慕之意。與此同樣的表現手法還有〈女曰雞鳴〉，輔廣說：「一意而三疊之，以見其情之不能自己也。」⁶⁴可見重複三次的寫作手法，也是為了表現無法自我控制的強烈感受。

⁶⁰ 〔宋〕輔廣：《詩童子問·鄭風·緇衣》，頁317。

⁶¹ 〔宋〕輔廣：《詩童子問·周南·芣苢》，頁298。

⁶² 〔宋〕輔廣：《詩童子問·魏風·園有桃》，頁322。

⁶³ 〔宋〕輔廣：《詩童子問·周南·漢廣》，頁298。

⁶⁴ 〔宋〕輔廣：《詩童子問·鄭風·女曰雞鳴》，頁318。

除了上述的討論之外，寫作風格也可展現作者之情性。「用詞和緩」是他經常強調的重點之一。在〈鄘風·柏舟〉一章中，他說：

「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母也天只」，愛而尊之之辭。「不諒人只」，何其不諒我之心也？常人之情，人不已知而至於自辨說，則必有不平之氣，忿厲之辭，而共姜之言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其意愈切，其辭愈緩，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矣。⁶⁵

輔廣隨從朱熹接受《詩序》的說法，以共姜為此詩的作者。輔廣認為此章前二句，共姜表達不願改嫁的決心，後二句則是向父母發出盼能得到體諒的呼籲，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反差。然而就輔廣看來，此詩的作者意志堅強，但是在表達意願時，用辭和緩，這就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表現。⁶⁶又以〈旄丘〉為例，《序》以「責衛伯」為詩旨，但是朱熹卻認為如此不合乎詩文之意，進而主張「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⁶⁷但是「優柔不迫」所指為何？朱熹沒有說明，輔廣則在《詩序辨說》中說：

以「伯兮」為衛伯，則「叔兮」復何指也？故先生但以為衛之諸臣者，得之。且此詩正以欲責其君而但斥其臣，可見詩人優柔不迫之意。儻以為責衛伯，則失了此詩好意思矣。⁶⁸

又說：

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辭益緩，真可見其溫柔寬厚之情也。⁶⁹

從輔廣的解說中，可以得知朱熹認為「伯兮」與《詩序》最終要指責的對象是一樣的，但是為了更加貼近詩文之意，因此朱熹將責難的矛頭指向臣子，如此一來，詩人對衛伯的責難，才能以間接的方式呈現出來。輔廣特別指出，朱熹的解釋大有好處，其優點在於詩人雖然對衛國的執政者不滿，但卻以迂迴的手法，展現出從容和緩的態度，正是一種溫柔寬厚的表現。

⁶⁵ [宋] 輔廣：《詩童子問·鄘風·柏舟》，頁 310。

⁶⁶ 在輔廣看來，與此同類的詩，還有〈邶風·日月〉、〈邶風·旄丘〉、〈衛風·竹竿〉三詩。

⁶⁷ [宋] 朱熹：《詩集傳·邶風·旄丘》，卷 2，頁 35。

⁶⁸ [宋] 輔廣：《詩童子問·詩序辨說》，頁 267。

⁶⁹ [宋] 輔廣：《詩童子問·邶風·旄丘》，頁 306。

此外，輔廣還留意到，詩人的留白，也就是沒有寫出來的部分，同樣能傳達言外之意。如〈樛木〉之詩，輔廣說：「其美夫人也無夸辭，其禱夫人也無侈說，此又可見眾妾性情之正也。」⁷⁰他又注意到〈殷其雷〉的詩人「念其勞，美其德，『冀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情性之正矣」。⁷¹就前者而言，輔廣關注眾妾在稱美后妃之德時，並沒有說出誇大不實的言論；就後者而言，寫此詩的婦人即便懷念自己的丈夫，卻也只是顧念其奔波的辛勞，以及宵旰勤勞的美德，卻沒有寫出自己的哀愁與埋怨。這些語言當中的留白，也是詩人性情之正的表現。

至於什麼樣的寫作風格，足以展現作者的情性之失呢？輔廣曾在評論〈子衿〉三章時說：「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思之辭也。」⁷²也就是說，怨念深的作者，在用辭上自然也較極端。他曾在註解〈唐風·無衣〉時說：

請命於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⁷³

輔廣依循朱熹的觀點，將此詩視為貶斥晉武公之詩，因此將「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解讀為諷刺的口吻，凸顯作者得意洋洋、毫無節制的態度。然而，輔廣也提出，作者用辭隱晦，同樣未必是性情之正。他曾在比較〈邶風·谷風〉與〈氓〉二詩時說：

〈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衛之婦人，其文詞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如是其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⁷⁴

在輔廣看來，兩詩共通之處不少，同為衛之婦人所作，皆表述被人所棄之怨，並且兩詩敘述皆井然有序，但在悲怨的表述方式上，正凸顯二詩之作者情性大不相同。他認為〈邶風·谷風〉作者直接表述其悲情，是情性之

⁷⁰ [宋] 輔廣：《詩童子問·周南·樛木》，頁 297。

⁷¹ [宋] 輔廣：《詩童子問·召南·殷其雷》，頁 301。

⁷² [宋] 輔廣：《詩童子問·鄭風·子衿》，頁 319。

⁷³ [宋] 輔廣：《詩童子問·唐風·無衣》，頁 326。

⁷⁴ [宋] 輔廣：《詩童子問·衛風·氓》，頁 314。

正所致；〈氓〉之作者心中雖怨，然而用辭隱晦，顯露作者一開始就情性不正。輔廣在這裡引用孔子「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說法，⁷⁵強調一位有德的詩人，一定會有好的修辭表現，然而一首修辭手法高明的詩，未必能說明作者有德。此外，輔廣在解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時說：

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事其末者未必有其本。故自修者當務其內，而觀人者必察其本。⁷⁶

「內」與「本」所指為何？這就要先了解，輔廣如何理解人的性情狀態與遣辭用字的關係。在他看來，兩者之所以相關，乃是因為有共同的基礎「氣」，而控制「氣」的關鍵則在於「心」。他說：

凡人之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愈厲，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如此詩之詞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正矣。⁷⁷

在「辭」與「氣」的關係上，輔廣認為人的言辭會帶動氣，而氣也會影響人的用辭，君子責備人的時候，辭越多而氣越緩，氣緩則所發之言辭平和，這也就是「發乎情，止乎禮義」；常人則不然，辭越多與氣越暴戾，在暴氣之下所發之言辭則更加凶惡。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君子有「心」為主導，⁷⁸而常人之「志」無法主導「氣」，自然「心」的功能也無法發揮。⁷⁹輔廣的觀點一方面來自《孟子》「知言養氣」的概念，另一方面也連結於《大學》「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而此「身」字，輔廣以「心」代替，主要是延續程頤和朱熹的觀點。⁸⁰

⁷⁵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憲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7，頁149。

⁷⁶ [宋]輔廣著，田智忠輯校：《論語答問》，《輔廣集輯釋》中冊，頁913。

⁷⁷ [宋]輔廣：《詩童子問·鄘風·君子偕老》，頁310。

⁷⁸ 輔廣說：「言，心聲也。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言有不順，理不通達，即是心有不順，理不通達處也。……心正而明，則言無不達矣。」[宋]輔廣著，田智忠輯校：《孟子答問·公孫丑章句上》，《輔廣集輯釋》下冊，頁1066。

⁷⁹ 輔廣說：「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志即心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宋]輔廣著，田智忠輯校：《孟子答問·公孫丑章句上》，頁1066。

⁸⁰ 輔廣之所以將「身」字改為「心」字，乃是依循程頤和朱熹的解釋。程頤說：「『身有』

五、《詩經》義理詮釋下的「言外之意」

種村和史教授曾經提出，「言外之意」的存在，是為了從詩篇之內容導出道德性教訓，這樣的說法可以適用於整個《詩經》學史。⁸¹然而，若深究而論，主張廢《序》的朱熹，對於人的道德問題，從理學思想出發，自成一格，輔廣則是一脈相承，落實於《詩經》的注釋之中，與尊《序》學歷史式的解讀，兩者的視角並不相同。因此，如果要更深入地把握輔廣對《詩經》「言外之意」的理解，那麼他對心性論和工夫論的觀點，便不容忽視。因為對輔廣而言，對《詩經》的理解不僅在於《詩經》文本的層次，同時也是實踐心性工夫後的體認。⁸²朱熹主張「《詩》本人情」說，⁸³輔廣則是繼承朱熹的說法，加以引申發揮。例如〈葛覃〉一章，輔廣說：

先儒皆以首章為感時興念，而以後二章為終言其情之所欲，覺無意味。故先生以此詩為「后妃既成締結而賦其事，首章為追言其初時之事」，乃為得之。蓋人情於事之既成，而追念其始時之事者，宜也。故次章則遂言其采治之以為布，故服之而無厭斃；末章則又言既已服之，則思欲歸安其父母者，亦宜也。⁸⁴

輔廣指出朱熹反對前人說法，進而轉為追憶的手法，來說明此作者之意。他認為朱熹的意見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因為人在事情發生之後，回想過往之事，乃是人之常情。因此輔廣可說在朱熹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落實以「人情」的立場解《詩》。

之身當作心。」朱熹在《大學章句》中，引程頤之說，解釋「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頁8。因此輔廣將「身」字替換為「心」，乃是取此義。

⁸¹ 〔日〕種村和史：〈「言外の意」の遠近法：その多様性、および詩經の意味の重層性における位置付け〉，頁12（375）。

⁸² 陳逢源已指出，輔廣「以自身操持體察，成為印證朱學重要材料，所聞收入李道傳在池州刊刻的《朱子語類》（「池錄」），成為《朱子語類》重要來源」。並且從今本《朱子語類》輔廣所錄之內容中，可以看見朱熹提醒輔廣要仔細品味經典中的文字，務求精熟，並且還要體察是否與己心相契，方能得其滋味。陳逢源：〈體察與思考：《四書大全》中的輔廣〉，頁283-284。

⁸³ 〔宋〕朱熹：《詩集傳·詩傳綱領》，頁8。

⁸⁴ 〔宋〕輔廣：《詩童子問·周南·葛覃》，頁296。

至於輔廣究竟是如何理解「人情」呢？首先，輔廣認為「人情」同時包含「天理」與「人欲」。他在解釋〈小星〉說：

大抵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天理明；窘則慙亂，慙亂則人欲熾。「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眾妾之情，紓平樂易，理明欲消，皆能勤其事，躬其勞，知其命分之當然而安之，無逸志，無怨言也。此豈勉強矯揉之所能哉。⁸⁵

輔廣認為人若表現得和樂平易，是天理的彰顯，困厄煩亂則是人欲的表現。他沿襲《詩序》到朱熹的解釋，認為〈小星〉之詩所陳明的是南國夫人受到后妃之化，能有不妬忌之心，因此眾妾表現出和樂平易的態度，安分守己，勤於服事。由此可見，輔廣認為形而上的天理，需要透過形而下的人情中彰顯，因此詩人所描繪的眾妾之情，乃是形而上之性在經驗世界中的表現。例如〈泉水〉一章，輔廣說：

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不謀，惟恐人之或知也。故《書》曰：「弗詢之謀勿庸。」言其必私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⁸⁶

他點出一般人對私情的反應，是隱而不發，但是本詩作者衛女則不然。她雖思歸之情，卻能與姊妹們商議，這是不徇私的表現，表現出情性之正。又如〈四牡〉一章，他的解說是：

「悲傷」言其情思者，最可玩。其私恩雖不能不懷歸，而其公義則又念王事之不可不堅固，如此而悲傷，則得其正矣。⁸⁷

輔廣稱許詩人悲傷之情思，乃是情性之正，其判準在於他意識到作者既有思歸之私恩，又能秉公義之心，顧及國家之事，都是情性之正的表現。

然而，輔廣也注意到人情之中，還有欲望的問題。這在朱熹所說的淫詩中，最為明顯。他說：

〈山有扶蘇〉以下四詩，雖皆為淫女戲謔之辭，然其指意亦不同。
 〈山有扶蘇〉已得而其欲未饜之辭；〈蓀兮〉未得而亟欲得之辭；

⁸⁵ [宋] 輔廣：《詩童子問·召南·小星》，頁 301。

⁸⁶ [宋] 輔廣：《詩童子問·邶風·泉水》，頁 307。

⁸⁷ [宋] 輔廣：《詩童子問·小雅·四牡》，頁 335。

〈狡童〉則已絕而又欲別圖之辭；〈褰裳〉則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辭也。《序》併以此四詩為刺忽，誠無情理。⁸⁸

朱熹反對《詩序》將這四首詩視為「刺忽」之作，輔廣依循朱熹的看法，仍視此四詩為一整體，全都歸於淫詩。輔廣總括這四詩的關聯性時，皆以「欲」字強調作者之意，這也反映出此四詩之所以為「淫」，與「欲」息息相關。對於「欲」的理解，朱熹較程頤更為複雜。「存天理，去人欲」是程頤所提出的說法，主張理與欲不可並存，朱熹則是更細膩地看出，欲是人情中必然的存在，也就是說天理與人欲並不完全對立。朱熹曾經如此比喻「情」與「欲」的關係，他說：「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⁸⁹因此，對朱熹而言，不是「欲」就必定為惡，而是「欲」是否毫無約束，也就是所謂「不好底波瀾」。輔廣則沿襲朱熹的觀點，他曾說：「〈狡童〉、〈褰裳〉二詩，則其縱欲而賊理也，甚矣。」⁹⁰由此可見，輔廣認為放縱慾望也就是闕害天理，兩者是平行的。那麼，要如何才能使人情回歸天理呢？以輔廣疏解〈蝮蝥〉三章時曾說：

男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乎天理矣。⁹¹

他強調人對於慾望要有所節制，然而他並不只是停留在消極的一面，乃是要以「道」也就是「理」取而代之。他在這裡所提到的「命」，不是命運的概念，而是性命之命。⁹²此外，與「制」相類似的還有「畏」的態度。他曾說：

⁸⁸ [宋] 輔廣：《詩童子問·鄭風·山有扶蘇》，頁 318。

⁸⁹ [宋]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5，頁 93。

⁹⁰ [宋] 輔廣：《詩童子問·鄭風·褰裳》，頁 318。

⁹¹ [宋] 輔廣：《詩童子問·鄭風·蝮蝥》，頁 311。

⁹² 蒙培元先生說：「在儒家哲學中，命字有二義，及兩個不同層面的意義。一是指命運，如同孔子所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由子夏說出），就是指這種命；一是指性命之命，如同《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易傳》所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及孔子所說『五十而知天命』之類，就是指這種命。」蒙培元：《情感與理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173-174。輔廣所說的「命」，應該指的是後者。

〈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而自必，人之不可近。此所以二南之化也。豈有淫奔之心？必待於有所畏而不敢也。⁹³

在輔廣看來，〈漢廣〉作者筆下的出遊之女，〈野有死麕〉作者筆下的受吉士引誘的女子，並沒有淫奔之心，就是因為「有所畏而不敢」。或是〈載馳〉當中，輔廣眼中的許穆夫人，「其初畢竟是犯不義，但能聞義而自克，為可取耳」。⁹⁴總之，對輔廣而言，人如何能夠在流動的情感中，依循天理而不徇私欲，則需要靠著「止」、「制」、「畏」、「克」等態度，同時也要順應天理，以便導正情性。很顯然地，輔廣從朱熹理學的觀點出發，從道德修養功夫的角度，賦予「發乎情，止乎禮義」更深刻且複雜的含意。

不僅如此，輔廣還強調人情感活動中的真情實感——發自內心的最原始、最真實的感情。⁹⁵這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互相感應的基礎。他在解說〈常棣〉時說：

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得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則人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⁹⁶

輔廣認為這首詩周公作於平定管叔、蔡叔之亂之後，因此對於死喪、急難、禦敵之事，感觸特別深刻，並且在此情境之中，他對於兄弟之情的感受，更加深摯真切。此外，輔廣還留意到此詩第八章最後一個字，作者特別使用「乎」作為疑辭之用，為要表達作者「不自以為然，而使之友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⁹⁷顯然在輔廣看來，真情與實理同時出現。若進一步來看，輔廣所說的「情」中蘊含著天理，如同朱熹所說：「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⁹⁸同時，輔廣也意識到，在此層面上，人與物、人與人皆可以互相感應，這個觀點出現在輔廣對〈鹿鳴〉的詮釋中。他說：

⁹³ [宋] 輔廣：《詩童子問·王風·大車》，頁 316。

⁹⁴ [宋] 輔廣：《詩童子問·邶風·載馳》，頁 312。

⁹⁵ 蒙培元：《情感與理性》，頁 19。

⁹⁶ [宋] 輔廣：《詩童子問·小雅·常棣》，頁 366。

⁹⁷ 同上註，頁 337。

⁹⁸ [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3，頁 238。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之真情也。故以興「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己之真情也。「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又以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也。如此，而人之好我者，則必非矯偽而然矣。⁹⁹

在輔廣看來，作者之所以以鹿鳴起興，是鹿之真情引發人之真情，再由己之真情，感動他人之真情。這就如同漣漪一般，可以不斷傳遞。

此外，關於「情」與「禮」的關係，輔廣主張人情之中即包含「先王之禮」，「禮」自會在人情當中完成。輔廣解說〈泉水〉二章時說：

衛女思歸之情方切，而遽自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則知先王之禮亦只在人情之中，特縱情肆欲者之不察耳。此衛女之所以即諸姑伯姊，而與之謀其可否也。¹⁰⁰

他認為此詩之衛女想要歸寧，由於父母已歿，於是問及姑姊，這是先王之禮在人情中自然的表現。也就是說，人只要不放縱情欲，自然會顧及禮的完成，兩者具有連續性。

六、結論

「言外之意」作為一種解釋《詩經》的方法，就如同果樹的「嫁接」——歷代詮釋者就像果農一樣，將他們所主張的重要觀點，接枝在《詩經》文本上面，使其與《詩經》成為一體，以期結出豐盛的果實，好讓讀注者品嚐到其中的滋味。在尊《序》者的手中，「言外之意」的說法，可以確保〈小序〉與詩篇之間連結的關係，對於「美刺」說有一定的調節作用，¹⁰¹並且具有社會作用與政治功能；在廢《序》者朱熹和輔廣的手中，雖然並未完全否定《詩經》有「美刺」之說，¹⁰²但是更重要的是凸顯〈詩大序〉「發乎情，止乎禮義」的重要性，進而探討「人之情性」的複雜性，並且對其做出理學思想的詮釋。此外，對於「言外之意」為何人之「意」？在尊《序》者的眼中，除了作者之意外，更加關注聖人與國史之意，但是對廢《序》者而言，作者之意與讀者之意，才是最需要關注的焦點。但是值得留意的

⁹⁹ 〔宋〕輔廣：《詩童子問·小雅·鹿鳴》，頁335。

¹⁰⁰ 〔宋〕輔廣：《詩童子問·邶風·泉水》，頁307。

¹⁰¹ 黃忠慎：《嚴粲詩緝新探》，頁30。

¹⁰² 〔日〕種村和史：〈「言外の意」の遠近法：その多様性、および詩經の意味の重層性における位置付け〉，頁45（342）。

是，在「言外之意」的掌握上，作者與讀者之意未必一致，特別是朱熹所認定的「淫詩」，反映出作者的情性不正，讀者需要「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其所以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書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¹⁰³雖然朱熹這麼說，但是修養功夫需要讀者自己實踐，《詩經》文本方面發揮不了直接的作用，只能靠注釋的內容間接加以提醒而已，但是朱熹在《詩集傳》中著墨不多，而是到了輔廣手中，才明確地從理學思想注解《詩集傳》，可以說將《詩經》的理學化，往前推進一步。

至於《詩經》在「言外之意」表述型態上，不僅從內容來看，也可以在修辭手法中領略。這個問題早在北宋司馬光就已言及，¹⁰⁴到南宋朱熹也僅是點到為止，¹⁰⁵但是在輔廣手中卻是更深入地發揮文學與理學的關聯性。他認為修辭手法，也是詩人有意識地呈現《詩經》「言外之意」的重要方式之一。他發揮孔子「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概念，主張《詩》之文本的修辭方式，反映出作者的情性狀態，與其德性密切相關。雖然輔廣對於「人之情性」的討論，主要繼承朱熹「《詩》本人情」之說，然而他從《詩經》中所呈現的經驗世界出發，強調「人情」中雖有「天理」和「人欲」兩面，但是並非如同程頤所說「存天理，滅人欲」，兩者截然對立，而是人在欲望中如何發揮「止」、「制」、「畏」、「克」的精神，於人情中體現天理，並且在真情實感中，自然完成「禮」的要求。這可說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理學詮釋，深化〈詩大序〉的論點。

【責任編校：黃璿璋、許庭慈】

¹⁰³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23，頁547。

¹⁰⁴ [日]種村和史：〈「言外の意」の遠近法：その多様性、および詩經の意味の重層性における位置付け〉，頁1(386)-4(383)。

¹⁰⁵ 朱熹說：「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敘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80，頁2083。

徵引文獻

專著

- [漢]毛亨 Mao Heng 傳，[漢]鄭玄 Zheng Xuan 箋，[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唐]陸德明 Lu Deming 音釋，朱杰人 Zhu Jieren 等整理：《毛詩注疏》*Maoshi zhu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3 年。
- [宋]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年。
- ：《論孟精義》*Lunmeng jingyi*，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9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1986 年。
- ：《詩集傳》*Shi jizh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7 年。
- [宋]朱熹 Zhu Xi 著，陳俊民 Chen Junmin 校編：《朱子文集》*Zhuzi wenji*，臺北 Taipei：德富文教基金會 Defu wenjiao jijinhui，2000 年。
- [宋]朱熹 Zhu Xi 著，朱杰人 Zhu Jieren、嚴佐之 Yan Zuozhi、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朱子全書》*Zhuzi quan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2002 年。
- [宋]金履祥 Jin Lüxiang：《論孟集注考證》*Lunmeng jizhu kaozheng*，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20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1986 年。
- [宋]輔廣 Fu Guang：《詩童子問》*Shi tongzi wen*，收入《詩經要籍集成（修訂版）》*Shijing yaoji jicheng(xiuding ban)* 第 8 冊，北京 Beijing：學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2003 年。
- [宋]輔廣 Fu Guang 著，田智忠 Tian Zhizhong 輯校：《輔廣集輯釋》*Fu Guang ji jishi*，福州 Fuzhou：福建教育出版社 Fujian jiaoyu chubanshe，2017 年。

- [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朱子語類》*Zhuzi yule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4 年。
- [元]徐碩 Xu Shuo：《至元嘉禾志》*Zhiyuan jiahezhi*，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49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1986 年。
- [元]馬端臨 Ma Duanlin：《文獻通考(五)》*Wenxian tongkao(5)*，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61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1986 年。
- [元]劉瑾 Liu Jin 著，李山 Li Shan 主編：《詩傳通釋》*Shizhuan tongshi*，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13 年。
- [清]永瑤 Yong Rong 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Qinding sikuquanshuzongmu*，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1986 年。
- [清]朱彝尊 Zhu Yizun 著，林慶彰 Lin Qingzhang 等編審：《點校補正經義考》*Dianjiao buzheng jingyi kao*，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suo choubeichu，1998 年。
- 王倩 Wang Qian：《朱熹詩教思想研究》*Zhuxi shijiao sixiang yanji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9 年。
- 徐復觀 Xu Fuguan：《中國文學論集》*Zhongguo wenxue lunji*，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74 年。
- ：《中國文學論集續篇》*Zhongguo wenxue lunji xupian*，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84 年。
- 郝永 Hao Yong：《朱熹《詩經》解釋學研究》*Zhuxi Shijing jieshexue yan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4 年。
- 黃忠慎 Huang Zhongshen：《朱子《詩經》學新探》*Zhuzhi Shijing xue xintan*，臺北 Taipei：五南圖書 Wunan tushu，2002 年。
- ：《嚴粲詩緝新探》*Yan Can shiqi xintan*，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2008 年。

- 黃忠慎 Huang Zhongshen :《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姚際恆、崔述、方玉潤》 *Qingdai duli zhi Shi sandajia yanjiu: Yao Jiheng, Cui Shu, Fang Yurun* , 臺北 Taipei : 五南圖書 Wunan tushu , 2012 年。
- 蒙培元 Meng Peiyuan :《情感與理性》 *Qinggan yu lixing* , 北京 Beijing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2009 年。
- 檀作文 Tan Zuowen :《朱熹詩經學研究》 *Zhuxi shijingxue yanjiu* , 北京 Beijing : 學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 , 2003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 朱杰人 Zhu Jieren :〈朱子《詩傳綱領》研究〉“Zhuzi Shichuan gangling yanjiu” , 收入鍾彩鈞 Zhong Caijun 主編:《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 *Zhuzixue de kaizhan: xueshu pian* , 臺北 Taipei : 漢學研究中心 Hanxue yanjiu zhongxin , 2002 年。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 :〈體察與思考:《四書大全》中的輔廣〉“Ticha yu sikao: Sishu daquan zhong de Fu Guang” , 《政大中文學報》 *Z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37 期 , 2022 年 6 月。
- 黃忠慎 Huang Zhongshen :〈經典、道與文字——輔廣與楊簡《詩經》學之比較研究〉“Jingdian, dao yu wenzi: Fu Guang yu Yang Jian Shijing xue zhi bijiao yanjiu” , 《政大中文學報》 *Z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16 期 , 2011 年 12 月。
- 〔日〕種村和史 Tanemura Kazufumi :〈「言外の意」の遠近法: その多様性、および詩經の意味の重層性における位置付け〉“Gengai no I” no enkinhō: sono tayōsei, oyobi shikyō no imi no jūsōsei ni okeru ichizuke” , 《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人文科学》 *Keiou gijuku daigaku hiyoshi kiyou, jinmonkagaku* 第 35 期 , 2020 年 6 月。
- :〈増殖する言外の意: その共時的通時的様相と詩經解釋學史上の意義〉“Zōshoku suru gengai no imi: sono gojiteki tsūjiteki yōsō to shikyō kaishakugakushi e no imi” , 《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中国研究》 *Keiou gijuku daigaku hiyoshi kiyou, Chūgoku kenkyū* 第 14 期 , 2021 年 3 月。

